

東北現代文學史料

第三輯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第三辑目录

一九八一年四月

- 早年的影 舒群 (1 页)
追忆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琳 (12 页)
舒群和他的第一个老师 董兴泉 (16 页)
绝艳霜刃 辉耀千秋 卞和之 (21 页)
——忆田贲同志
争将热血献灾黎 郁其文 (27 页)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

- 没有祖国的孩子 舒群 (35 页)
时代风云的录映 国际主义精神的颂歌 刘风艳 (47 页)
董兴泉
——评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
论马加的创作 李兴武 (54 页)

作家传略

- 萧红传 肖风 (64 页)
马加小传 辛武 (93 页)
田贲生平事略 卞和之 (97 页)

- 访问记 访作家端木蕻良 胡文彬 (100 页)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 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东北报刊
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部分目录索引
.....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东北现代文学史研究小组 (103 页)
大连《泰东日报》一九二六——一九四一年
文艺期刊主要作家作品目录索引
..... 辽宁师范学院张志勋辑录 (140 页)
《泰东日报》简介 潘喜廷 (157 页)

参考资料

- 伪满映画株式会社的十四条反动宗旨
(原载一九四一年满州国年鉴)
..... 徐继成 译 (159 页)

早年的影

——忆天飞 念抗联烈士

舒 群

偶然，金伦于一九七九年秋来访，为出版其父金剑啸烈士文集而邀我口述《思念》，由里栋整理成章，先后发表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哈尔滨日报》副刊。今又偶然，王时泽外孙陈漱渝来访，促动此时激情，复现早年的影，引我催我写起这一文。

王时泽是以前哈尔滨商船学校校长。该校亦即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教师多属海军现役军官，仿佛无军籍的只有语文夏老师、数学冯仲云老师身穿长衫、长袍，呼扇呼扇的。一九三〇年夏，我入驾驶丙班。九一八事变第二年，该班并入青岛海校。七七抗日战争爆发，马当一战，他们颇有伤亡。近几年来，从参考材料得知，他们部分仍在台湾，某人曾任“海军总司令”，某人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在希望他们响应中共的号召，尽快回归大陆，有助于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而以同窗之谊，同扫天飞的墓地，我入学当年，除丙班外，还有驾驶甲乙二班、轮机班、测量班；而甲班、测量班已毕业，或包括轮机班也在内。甲班同学们，大部分都被调到沈鸿烈第三舰队——青岛海军去了。如我没有弄错，一九三四年与我同室被囚的中共青岛地下市委书记、八一五前夕牺牲于胶东的山东八路军指挥者之一，而于烟台建起高大纪念碑的高嵩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甲班同学。该班留在哈尔滨的同学，大约只有七名：傅天飞、王绍文、蒋凤翥、任、夏……我与他们都有过交谊，目之为学长、兄长，但为时已久，有的连姓都想不起。的确，光明无情，如流水一般地流逝着，把峭壁磨出卵石面，把记忆将要磨光了；一霎眼似的，逝去了几日、数月、几年……到一九四六年，我重新回到哈尔滨、眷恋的解放的哈尔滨，仅仅见到一位王绍文，听到一位傅天飞的遭遇。是冯老师、敬爱的冯老师——抗联领导人告诉我的天飞作为抗联领导者，在与敌人激战中，英勇战斗的事迹，壮烈牺牲的噩耗的。听时，我流了泪，记了笔记。这笔记于浩劫中丢失，这哭天飞的泪也早已干了。但是，我还有流不尽的泪，可以再湿我的衣；而记天飞的笔记丢失，往哪儿去找呢？好个浩劫，不仅生者受戮，连烈士还要遭殃呢。我深悔，最悔在哈尔滨我与天飞最后的诀别，为什么没有拉住他多饮一盅酒，再多照一张合影的像片呢？假使如今有这张像片，不管置于桌前还是悬在墙上，让我和他永远在一起，让他的笑脸、他的青春之美，永远陪伴着我，亲近着我……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他的甲班同学们，是在期待他们改正我所写的谬误。当然，我也请求他的战友们、家属们弥补我所写的大不足——他的可为人师的品格，应予完全加以显示，深化，美化……本来，他是一位最美的人，革命乐观主义的美的化身。

我与天飞相处的三年多，是一幅美丽的水彩画。现在，经过整整半个世纪风雨的剥蚀，

残缺而模糊，我以颤抖的心，痛楚的意绪，硬要把它重新描绘，即使神手天工，也难以复原了吧？！何况我这暮年，我这拙笔呵。呜呼哀哉，为天飞，也为自己。

在哈尔滨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有一座孤零零的楼房，原是商船学校的旧址，今天它还有没有，或做不做什么用，都不要问，我只想问：是否还留存我与天飞的早年的影——门里门外的足迹、楼梯把手的指纹、阅览室的一星点儿什么痕迹？早先，楼是红色的，从未改色；一年四季，单见军装轮番变换白、黄、黑三色。这学校，与世隔绝，同监狱一样，铁网一围，防范森严；同庙宇寺院一样，宁静恬漠，不染红尘；同孤岛孤山一样，空空落落，满眼荒凉，是一处多么奇特的境界。然而，学生供给，一律官费。衣住不说，食的双合盛一、二、三号面粉，学习用的是派克钢笔、英国仪器、英国的对数表；除此，每月发给五元补助费，随你零用，买牙膏肥皂之类。按学校招生简章规定的毕业年限，天飞该在这里度过三年半的时光。而我跟他在校相识时，不记得这是他的最后半年的延期还是开始，也不记得这是他的在校还是返校，反正初识之后，似乎在校就没怎么见着他了。据此，他的入学，该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季或秋季；以此推算，他比我该大三岁上下。如果他象我幸存下来，现今他也只有七十岁吧；那么他还能为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的四化贡献力量，而且会比我的贡献又多又好。恻，恻呵。

一九三〇年夏，我入丙班的初期的一个星期日，晴空无际，阳光媚人，同班同学们都过江南游逛去了；独我留校，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穷学生，不渡江南可以节省船费饭费。我之投考商船学校，并不是出于醉心它“造就海军将校之材”的宗旨，而无非为它的“官费”而已。我走出教室往阅览室去，踟蹰踟蹰，看看报纸；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盛京时报、益世报、申报……我原以为那里不会有人，没有想到走进室内，却见烟雾腾腾中隐蔽着一个坐在桌旁的吸“大白杆儿”（老巴夺烟草公司出品俄罗斯式的长管烟卷）的同学、老同学——由于他穿的是旧军服，加之他敢于那么放肆地大吸特吸其烟而无所顾虑之故。无疑，他的烟癖之大，可能类乎烟鬼吧。他的面部白净，而双颊呈现两团天贼的红晕，象女性的美似的。他抬头看到穿着崭新军装的我，稍稍一愣，而后亲热地微笑地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他那闪着智慧光辉、机警神采的大眼睛盯着我，犹如带有芒刺似地刺着我。

“你是丙班新同学吧？！”

“是。”

大概他发觉新同学对老同学而出现的拘板，便爽快地作了自我介绍。从此，我记住他是傅天飞。后来，我又听到老同学们叫他“小苹果”。显然，这个漂亮的绰号，是起于他的别致的红晕的。

“你爱看报吗？”

“是。”

“爱看什么报？”

“随它什么报。”

“你知道什么报是什么背景、倾向吗？”

他一口东北话，说“倾”发“吭”的音，我也同样。但我后首改了过来；他呢？

“我不知道，连背景、倾向我也没大听过……”

“噢……你是个老实人、老实同学……”“……”

他这种鼓励的赞语，使我感到不好意思，浑身发了热；不用说，我的脸比他的红晕更红，必然露出一副尴尬相。而他总是那么一副笑脸；微微咧开嘴，透出一溜白牙齿；略略眯缝着的眼睛，蓄满着笑意……他从桌上一些报纸底下抽出两页纸张，明显地看得出，即使这不是他放来的，事前他也看过，知道它的所在；随手，他把它递给了我。

“你看过吗？”

我看了看，是共产党、反帝大同盟的传单和标语。

“在这儿没看过。在一中看过，是有人偷着贴在揭示牌上的。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组织的的化装宣传活动，有人还要我帮他撒过这类传单和标语……”

“你懂吗？”

“懂些。”

“怎么懂的？”

到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他一直是在了解我的思想觉悟的程度……以后，我没问过，他也没说过，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我在中东铁路苏联子弟学校读过书，听老师天天讲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故事。在一中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教语文的杨老师，常常讲进步文学、革命道理……”

“是杨定一老师吗？”

“是他。”

“周一粟、陈小航老师呢？”

“他们不教我们的班。可我跟他们很熟识。我们左倾同学们私下都叫他们‘红色老师’。在周老师被捕后，我还参加请愿队伍，去警察厅援救过他……”

他站起身，从桌上把身子向我倾过来，放轻说话的声音。从那之后，他与我谈话的声音，往往如此低沉，是他在向我倾吐心灵深处的隐秘和肝胆之情；经过多少时时刻刻，我才领悟到他给我的这一肺腑的实感。少年、青年朋友的久久不忘的可贵之处，在于一见倾心，心心相印；相识于偶尔，而相知于长远——人世之妙。

“咱们的冯仲云老师、你熟吗？”

“刚刚认识。我想往后是一定能跟冯老师熟的。我听说，他也红……”

……不知道，我们断断续续地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我还记得他说了这么一句。

“……你是个有觉悟的人，有觉悟的同学……”

……不用说，我的脸比他的红晕更红，必然露出一副尴尬相。而他总是那么一副笑脸……我与他相交三年多，他始终是那么一副笑脸……这次初识的从容的谈话，所涉及的内容，是最广泛的，丰富多彩的；而今被五十年来的浪潮冲淡了，漫漶了，破碎了。我为我无补天锯地之力而锯补这冲淡的漫漶的破碎的回忆脉络，深感愧疚。而今我唯一记牢的，只有他的笑脸，仿佛一座历年虔心保存的石窟的精琢石雕、古刹的彩绘塑像。是明确无误的，完美无缺的。我之屡屡写到他的笑脸，是因他的笑的不同，大大不同，不同于那些借船员之便、航黑河虎林私贩大烟土而获暴利发横财的笑，那些贪图增添军阶一条金杠而奔走达官贵人，卖身投靠张小六之门流下的笑，那些忘形于醉生梦死的花天酒地——“圈里”（哈市道外十七道街旧日妓院聚集的场所）苏杭班打茶围、开盘子而取乐青信儿的笑……而他的笑，是向理想

的笑，向未来的笑。他的笑，是无私无邪的，高尚的。他的笑，闪烁着青春的魅力，春光的明媚，生命的火花。为他的笑，发自他所投师——马列主义、为民族解放、阶级翻身而不惜最后牺牲的决心和忠心。他的笑，表现他无愧于人——哈尔滨人民、全国人民。他，他是最会笑的人。

当然，他的笑也有收敛的时候。那是在他看到本庄繁的“布告”、张景惠的屈膝投降、溥仪的粉墨登场、敌人骑兵宪兵以及狗腿子满街横行的时候，他瞪起眼睛，简直成为怒目而视的金刚了；他爱憎分明，与敌伪誓不两立，终于参加了抗联。那是在他看到面对这国破家亡的现实，有多少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风流才子”甘心堕落、沉沦，以罌粟花掩饰着自掘的墓穴，以终可耻的余年；而恰恰道外十六道街又有一家大烟馆开市，门口贴起对联“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和横批“进来抽点”的时候，他怒不可遏地赶上前去，把它撕掉；他不能容忍自戕、自杀以及自暴自弃而貽笑大方，有失中华民族的尊严。那是在他看到一些朋友欢聚的酒后，有一个醉汉跟他开玩笑，象哈尔滨惯用中国化俄语译音所说的“别力达”（炉）、“维大罗”（桶）、“巴少”（走）、“巴斯拉”（去）似地跟他说“服拉服拉毛斯”（淫语）的时候，把他气得发抖，一甩袖子，走了；他可以听笑话，但不可流于无聊无耻，也不可至于低级下流；不然，他只有反对，抗议。另外，那是在他看到一位断双腿的老妇人爬行正阳街，哀叫“有钱的老爷们、太太们，行好的老爷、太太们，赏我老婆子一碗半碗饭吃吧！……”的时候，他飞奔上前，倾囊以助；但，他既不忍目睹人寰惨剧而疚心于己的折磨，又要逃避有所施舍而炫耀任何美德于人的嫌疑，于是尽快隐身遁去。躲到一边，暗泣了。他的泪，有如铁水那样的热；反之，在冷却之后，它又是那样坚硬，无情——“怒目”、“撕掉”、“发抖”；不过，他也只限于此，从不说句“屁的”、“妈的”肮脏语；因为其心一如其表，干干净净，他的品质是纯洁的，性格是温和的，文雅的，甚而有点儿腼腆。

为了追溯早年的影，我虚掷了多少宝贵的日夜，而落笔寥寥无几，几个句、几个字而已，连一缕念念情思都穿连不起。我的可恼的“忆”呵，相似少年远足的游子，老年迷途的归者，任它深山老林、沙漠大野，步步都在试探、摸索……噫。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底或三一年初，准确的年月，只有问问在世的薛文同志和忆罗（以纪念满洲省委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烈士而命名）同志母女。但彼时的忆罗，尚在襁褓中，她怎么能记得这个呢？归终，还是自己要靠自己的全力以赴。而思忆及此，我脑里出现的都是片片断断的朦朦胧胧的似是而非的梦境似的情景。那时候，在天飞的关注下，我与冯老师建立了友谊，他以朋友相待，而我以师长相敬，至到五几年他住北京北海，在我去时，同样如此，在哈期间，我有几次去过他家，当中至少有一次是我和天飞一起去的。我记得冯老师家住在江桥北端东侧，而比商校近得多，位于桥墩附近的陡坡上，坡下似有一条小溪，流入松花江；我们去时，它在结着冰的吧？！我们过了矮篱笆墙，走进白俄出租的房间，至今我还保有赏心悦目的感觉。我们见了冯老师和他的夫人薛文同志，加了一个小人儿——初生不久的女儿忆罗。天飞凑到她的跟前，一面注视她，一面跟冯老师说话。

他说：“……长的好……长的好……好看……好看……”

冯老师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错误的……女子无貌便是德，才是对的……傅天飞，你说呢？……”

冯老师故作讪讪之态，有风趣地跟天飞说着玩儿。他是一位使我敬爱的谈笑风声的人……

但在这里，我不适于过多地写，如可能在北京再访薛文、忆罗母女，去哈尔滨故地重游，另写一篇“忆冯师和他的亲人。”（恰好最近关沫南同志经金伦同志邀我作哈尔滨之行，尤有助于我的理想的实现。感谢关、金此番美意）。

虽说天飞是冯老师的得意门生，但在谈笑上却不是冯老师的手，无言可对之间，仅能报以笑脸。我知道他不善幽默。我与他一起的时候，几乎没有听过他一句调皮的逗眼的话。可是，他这次又不甘于沉默，只得结结巴巴了。

他说：“……她……她将……她将会比我们……会比我们……”

冯老师说：“……她将会比我们幸福，幸福得多，多得多……”

是的，冯老师的预言，是正确的。天飞死于抗日的战场，而他亡于浩劫中的以自己毕生之力为之奋斗而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北京中外作家春节联欢会上，我遇到了二十余年未见的年近五旬的忆罗。在茅盾讲话刚毕，她于这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以娃娃气怪模样儿与我握手相亲，其情其景，震撼我的魂魄而使一切最好的文学语言也都丧失了使用价值。是的，“她将会比我们幸福，幸福得多，多得多”，只要把“将会”改为“已经”就行了。

可能就在这一次，冯老师教我作一次数学游戏，给我六根火柴，要我摆成四个等边三角形。我摆着……他与天飞谈论着东北“易帜”（大约一九二九年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与中苏之战后的时局……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听命于蒋介石，大力镇压共产党，进步组织的形势，先后封闭了哈尔滨学院、哈尔滨书店、哈尔滨新报……而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辟了道路……我摆着三角形，但六根火柴怎么能够摆得成四个等边三角形呢？末了，可能是聪明的天飞以立体的四个三角形帮我交了卷。他帮我的还有，这是后话。

临走时，我们已经向冯老师和薛文同志告了辞，天飞又回过身，还走过去，跟忆罗摇着手，说着“再见”“再见”呢。

他那么喜欢忆罗，象幼女那么恋恋不舍地喜欢婴儿一样，连冒着春寒而破土的嫩芽幼苗他也喜欢；他的这个乐趣，不下于护园人的快感。实在的话，他是喜欢珍赏新生的，有生命力的，而压倒他的一切奢望、渴慕。他是乐观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应该加上是“革命”二字的。他乐观地展望他的理想。到底为新生的磐石游击队、有生命力的抗联的理想而献身。

商校的官费养活了我，但养不了我的穷家。因此于一九三一年初我转到航务局做俄文翻译。那是经过王福麟同学的父亲王魏卿总经理（东亚轮船公司）兼董事长（航务局），与王时泽校长兼总经理（航务局）的帮助的。同时，天飞担任了某轮船的二副。那时我住道外北七道街江岸的航业公会，当松花江没有解冻，和开航后轮船停泊码头的时候，我们是常常见面以及同吃同住同行的。我们在马迭尔、卡尔登、中央电影院和学校礼堂，看过《城市之光》、《黄票》、《故都春梦》、田汉《苏州夜话》、白薇《打出幽灵塔》等等，或许还在大舞台看过李金顺的评剧、在巴拉斯看过程砚秋京剧。我们去过水上俱乐部、东铁俱乐部、太阳岛、体育场、滑冰场、极乐寺、毛子坟、大小公园等处，或许还去过什么地方响着钟声的教堂。我们多次坐过绿波荡漾的和冰雪皑皑的松花江上的、人工铁钉撑着的爬犁、自己用柴划着的舢板；加上白俄驾驶的沿街流动的出租小汽车，还有白俄驾驭着俄罗斯贵族式的、骏马装饰着鲜丽的披肩和围臀的网状络子，飞驰林阴道上的高轮马车。我们多次饮过牛奶、布扎（饮料）、克瓦斯（饮料）、沃特克；多次吃过比洛斯卡（炸包子）。有一个夜

间，当观看德国乌发电影公司出品，以苏联十月革命为内容的《最后的命令》、场内红俄白俄双方武斗起来的时候，我们俩人理所当然地站在红俄一边，还负了一点儿小伤。又有一个傍晚，我们两人相伴徒步，是从马家沟还是从南岗通过霁虹桥走到道里。当我们在满街多是白俄男女的中央大街地下室酒店微醉走出的时候，或长椅小憩，或漫步横街，我好象是听他哼过夏里亚宾《船夫曲》和鲍狄埃的《国际歌》。他的哼法，别有趣旨，好象是把两个歌合在一起，一节一节地交替地哼的，既含混不清而避免暴露给暗探，又完全无碍于自己任性地抒情。他那么哼着，悲壮地豪放地哼着，抒发着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命运、同斗争、同解放的心绪。至今，写到这里停了笔，我要尽兴地听一听，还在耳边萦绕的他的哼声，隐约的哼声，好象是在昨晚听他哼过似的，谁敢说我们别了那般的久了呢？是你的记忆力衰退了，记错了，大错特错了。不是吗？

大概是五月间首次出航的那一天，我俩先约定过时间，我去给他送行而他请我吃西餐，但我到迟了，太迟了。他呆呆地等着，等着。同为他不轻诺，不寡信，重感情，重道义，所以他必然那般呆呆地等着，等着。人家都是家属送行，都以为他等的是他的妻子、或他的未婚妻，没想到会是我，当我进入船上餐厅的时候，有些人都吃完走了，白俄大副夫妇，大舵夫妇也都从胸前取下了餐巾。他十分满意，高兴，赶快拉我入座。

“剩下咱们俩吃，更好，更清静……咱们俩慢慢吃，吃着，看着江上的风光……”

透过三面大玻璃窗看出去，果然真是松花江的风光如画；但我心中，仍旧黯然失色……

“让你久等了……我太对不起老同学……”

我之愧对于他的，不仅是当天的迟到，而且有今日的“善忘”。我怎么也想不出他的家是否在哈尔滨，我是否去过他的家，和他是否有过妻子或爱人。回忆起来，凡是寄到航务局的他的信，差不多都由我转给他的；我没有拆过他的信，也不知道那些信里有没有年轻的姑娘叫他“飞”的。在我的印象里，仿佛没见他跟少妇少女同行过，而总是形单影孤的。如果我写的对，那么这位烈士竟然童来童去的一生一世，当然也就没有后嗣了。如此，我还能跟谁继承他与我的友谊呢？

这一年，我们的交往频繁，友谊更加亲密起来；直到九一八后几个月，大致也相同。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全市人民抗日的气势、情绪，高涨、沸腾起来；紧跟着，党领导的、自发的抗日活动爆发：集会、结队、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号召团结，鼓吹武装，誓死保卫哈尔滨，大大显示了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并且，大骂“攘必外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抵抗”的张学良，尤其是那个阴谋诡计多端的日本军事大特务土肥原——八一五后尾随东条英机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绞刑，上绞刑架了吧？！

这之间，我已经辞退航务局的翻译职务，准备参加义勇军去了。我忙，天飞更忙，屡屡见面，每每匆匆告别，彼此都再没有从前那么从容不迫了。

有一次，他找到我，是道里警察街还是南岗八乍市，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携带一个包袱。

“……我找你，是要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他打开包袱，从中拿出一捆纸张给了我。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行吗……？”

“……行……”

“……最好撒在秋林、同发隆、大罗新、闹市市场哪个地方……随便你吧……”

我记不得撒在哪个地方，则记得当时引起的十个想头：我在阅览室看的标隔传单，一定是他搁的；那么，那时候他就有了组织关系和革命活动……可是，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我参加革命参加党，也没有问过他。后来，我们两人，双方都在遵守党的纪律，互相从未打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开始认识他起，从猜测到确信他是团员或党员，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团入党、在团内党内担任过一些什么工作职务。直到最近，我才得读到关沫南《忆作家林珏》（《长春》1980.5）说他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细顾名思义地揣测起来，就该正是这一年、或包括这一年之前的若干时间在内地了。在松花江临近封江停航的一日下午，我们在道里江边突然碰见。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话，比往日更亲些，我觉得他的话里有一股甘甜的味道似的。

“……”

“……你在做啥？”

“我参加了义勇军……”

“啥义勇军？谁组织的？”

“学生义勇军，车凌云组织的……”

“他是干啥的？”

“九一八后，一中增加军训，新聘的军事教官。”“你了解他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面坡人、家是大地主。他本人当过东北军军官，是连长还是营长……”

“他是日本人进沈阳溃散的，还是早期退伍的？”

“不知道。”

“义勇军的领导人，是最重要的……可能，成败的关键就在他……”

“……”

“……我也打算去弄武装……咱们有一天，有一天抗日胜利会师……”

我们这次碰到到分手，我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恍惚之间，仿佛过去不几天似的。假如按小说的写法，我还能把他描写几页稿纸；被冷冷的江风吹着的他，手心的温热，笑脸的情深，红晕的鲜艳……而这一切并无女性感。

我带着一身热血，满脑子幻想参加了义勇军，而义勇军的“个人领导无方”，使我失望。一九三二春，我从山林退伍回到哈尔滨，参加“第三国际”，埋头于情报工作。这种工作，要我经常往外跑，在到处日本旗和伪满旗（一面黄的左上角是红蓝白黑）的旗下，在一片铁蹄和木屐的声中，面迎着敌人明晃的刀丛和暗藏的军火库，独自化装、蒙混、诡谲、日夜长途潜行，跑遍北满，哈市停留的时间，亦即有限，并要我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机密，以致我出头露面少了，与人来往少了，甚至个人兴趣也少了，连国联调查团的莅临、马占山的反正也引不起什么幻觉了。但是，我念念不忘天飞，而且，我知道天飞跟杨靖宇到磐石游击队去了。（在这里注一笔：我一贯认为抗联前期的磐石游击队是杨靖宇、傅天飞等同志创建

的。但去年从一位同志手边看到当初“第三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解放后哈尔滨公安局外事处处长杨佐清同志遗稿《风起盘石》，我才得悉他曾经是最初按满洲省委的指示而组织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而杨靖宇等同志是在他负伤之后接替他的工作的。）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还是经别人透露我的，弄不清了。左右这一年我与他见面少，究竟见过面没有？我也不敢说定，横竖似有似无，若真若假……松花江决堤，哈尔滨涨大水的时期，他似乎给我留过一点儿音容笑貌的印象，而细细追究一下，又来无踪去无影了……暂且存下空白，待我一旦记忆复明，另外再补这个缺。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天飞忽然闯进我暂住的商报馆。这个报馆是民办的，社长兼经理再兼跑腿的是个疤痢眼儿，总编辑是个大烟鬼，他们同心协力靠在市面活动，招揽（哀求）商家广告度日。每日每人分享广告费，有多多分，有少少分，三五角，块儿八角。不管分多分少，他俩总在和睦相处，从未闹过争吵；看来，他俩的心眼儿好使，是能一秉大公的。社长分得的钱都吃喝了，脸儿红彤彤的。总编辑捞着的钱都喷云吐雾了，饭呢？他向经理讨着吃，因为经理吃的饭还是要靠他的笔杆的。我同他们闹笑话，叫他们是讨饭的，办的是讨饭报馆。话虽这么说着玩，但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厚道、同情和帮助。这期间，我从外地回来，临时住在这花子店。天飞这位不速之客的现身，真使我喜出望外。看的出，他刚洗过澡，剪过头、换过存放已久的长衣、褶褶棱棱那么显眼。他一见到我，就把我搂抱起来。

“……哎呀……哎呀……老弟、老同学……咱们多久不见了，多久不见了……你可把我找坏了。多少次找你，一次又一次找你，都找不见你呵……这一次，我找遍工大、法大、温家、肖家……找‘美男子’也找不到，幸而找到了一只‘虎’，今天总算找到了你，找到了你……”

“美男子”——申云龙，我的朋友，九一八前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学生，当时学生界多以此称之。‘虎’者，即“五虎将”之一肖淑苓。在一九二九年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上，除肖外，尚有孙桂云、刘静贞、吴梅先、王渊，全包短跑冠亚军，被称为哈尔滨“五虎将”而驰名全国。因她们与我们同系当代学生，故闻之倍感亲切，而沿用其美称。特别是淑苓，其兄梦田和我同属一中同班同学，而与我极为友善，几经近百年头，前年她病逝于北京。

“……我想你……你也把我想坏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今天会来，万万想不到……”

我让他坐在晃悠悠的凳上，跟大烟鬼讨了一捏茶，泡了一壶，搁在晃悠悠的桌上，算是对老兄老同学的招待。他喝着茶品着茶，赞美着茶，显然，他长久没有尝过茶的滋味了。

“听说你工作忙得很，紧张得很，是那样吗？”

“忙也忙些，倒是紧张，老实说，紧张得很，紧张得很……”

“你没有功夫弄文学了吧？”

“没有了，有也不多了。你呢？你比我更糟了吧？”

“咱们俩的处境，有所不同，又有所同，同是处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这个严厉的环境，干革命就弄不了文学，弄文学就干不了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是这样吧？！”

“是这样，完全是这样……”

“不过，这是暂时的，暂时的……咱们还是要想到将来，将来……所以我特意给你带来一份礼物——一份宝贵材料……”

我伸出手去，等着接他的“宝贵材料”；而他以腴默的笑脸，指了指自己的腹部。

“腹稿……”

“腹稿”？触动我的激情，加重我的压力。我原来就装着一肚子“腹稿”——口供，是准备随时随地被捕，对付敌伪法庭用的。这类东西，日积月累，早把我的脑筋搅烂糊了。而他的“腹稿”，却是磐石游击队的史诗。我劝他保留着，以便将来他自己从事创作之用；因为他喜爱文学，他的文学修养比我好，还给我修改过诗文呢。可是，我看到他的神色骤变，表示不以为然。

“我说错了吗？”

“错了、错了……你想想，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得多……注意，我说的是‘保险’……万一……万一你我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

“噢，我明白了……”

于是，他讲起他的“腹稿”：磐石游击队从小到扩大到大发展的过程，生动地艺术地描摹了惊天动地的激烈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精神，凡此种种，他讲得淋漓尽致，讲了一天又一夜。

然而，我没有按他说的办，把他的“腹稿”转给了肖军，并邀他亲自前去重新讲了一遍。以后，肖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肖红《生死场》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亦是沾其余光的。（在最近美国《肖红评传》作者葛浩文先生的来访中，我已经说过将把这一篇给他看的意思。）

尽管我有负于他的初愿，但他那种一心向党、以身殉天职的英雄气概，那种崇高的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风格，永远在鼓舞我、感召我、启示我，不仅要向前看，而且要向高看，看他的高姿态、高风度、高水平。我永远感激他，并向他学习、再学习。

我与他再一次见面，说不定就是最后的诀别。一切都象有雾罩着，有纱裹着。记不得是秋是冬还是春，是雨纷纷、是雪飘飘、还是雨雪交加的混淆不清；终归是个黄昏，眼前象似隔着层层廉幕；而矫健的脚步，强有力的脚步、无所恐惧的脚步，不断地发出雪地的嘎吱吱或雨路的哗喇喇的强烈响音，有如哈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以抗联为榜样，要把市区变为抗日的战场似的。我从外地回哈，在正阳街口北侧或别的一条胡同，有一溜小饭馆——狗不理、独一处、坛肉王的旁边，与天飞巧遇。最初是他先看见我的，把我喊住。开头我没看出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或陌生人的误认。他，仿佛是个农民打扮。我印象的天飞，总是穿的军衣、毕叽服、西装、长衫袍……哪时看过他这一身穿戴，一见就愣住了。他把帽子往头顶一推，露出本来面目，这是天飞，但他的额头是有了皱纹，他的红晕被尘土和灰烟涂住，而他的笑脸依旧，依旧是他那闪着智慧光辉、机警神采的大眼睛盯着我，犹如带有芒刺似地刺着我。不过，他的动作沉着了，庄重了；由于他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和粉飞的战火的锻炼，显出他更老练，更成熟，从前偶而所见的轻浮之气不见了。我双手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拉住。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开始的。

我问：你从哪儿来？

他答：山里……刚下火车……

我说：走，跟我走……

他说：不行，不行……他指着身前等他的同伴。（我机灵地闪过一个念头，疑惑等他的这个人是谁？）

我说：不，我不放你走。

他说：……

没办法，他跟同伴嘀咕几句什么话之后，随我进了一家饭馆。屋里灯光明亮、高朋

满座，酒味烟气熏人。我们挤到背见小几一边，找凳子坐下。他一坐便从怀里掏出来他的宝贝——小烟口袋，从兜里摸出一张破报纸，舒展舒展，折起一边，出个棱棱，经舌尖抵湿过，撕下那片皱巴的纸条，用从前白净的柔嫩的而今疝过皴过的红肿的粗劣的污秽的手，手掌遍是疙里疙瘩硬皮老茧的手，手背尽是风裂或冻开而布满血纹儿的手，卷成一支蹩脚的烟，再用右手食、中二指夹着吸起来，深呼吸似地一口口地吸到只剩个小烟屁股，又改为大、食二指捏着吸着；其实，这已经不是“吸”而是“燎”了；这样久而久之的连熏带燎，把大、食、中三个指头都弄得焦黄焦黄的，指头尖儿竟是漆黑的了。我隔着小几坐在他对面，几呼脸对脸，挨着他那股近乎灶口燎的、炕缝冒的炊烟一般的呛，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并且，我注意他的吸烟，勾起我无限的感慨：从“大白杆儿”吸到粉包、蓝刀、耕种、从烟卷吸到卷烟，从烟丝、黄烟吸到树叶、蒿草，从标准卷烟纸卷到这样破报纸……唉，天飞呵，可怜而又可敬的天飞呵……他自觉地情愿地而视之如敝履地丢弃自己那二副的高薪金、那优裕的舒适的生活，而投身穷乡僻壤、刀山火海；他不贪生、不怕死，是生是死早已置之度外……唉，天飞呵，可怜而又可敬的天飞呵……

我悄悄出去用我外出工作节省下来的生活补助费，从街上烟棚子里给他买回来十盒“大白杆儿”。他一见到、禁不住一阵狂喜，连着吸了好几支，才算过了一场满足的惬意的瘾。然而，酒来了，他只喝了一盅酒，连猪蹄子都没来得及啃一口，便起身而辞。

辞，辞，表现十分绝决，不容丝毫和缓。这时，只有这时，我才破例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天飞，领教了天飞那么一条血肉之躯装的是，这么一幅铁打的心肠。

相逢近乎萍水，而相别的确过于突兀——人世多舛，奈之何。

年头久了，久了，有多多少少可留念的言语，都在混沌而迷离的梦般的记忆中含混了，消逝了，当初多么精美的耀眼的动撼心魄的刺绣品，而今仅见它背面的“丝线的毛头”（摹泰纳《梅里美论》语）。我只有从梦中求真，从沙里淘金；毕竟，毕竟求到淘到他的一块真金他的早年的影化为声，胜过录音机的录音。

“我的老弟，老同学，老同志，咱们的幸会，胜利告终……我的老弟、老同学、老同志，咱们风雨同舟，生死同心，将与人民同庆黎明……”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称我“老同志”，可惜声音过于低微，可惜是我一把没有把他拉住……怎么没有让他多饮一盅酒，再多照一张合影的像片呢？……他走了，望不见了，找不到了。天那么黑……

天飞，你往哪里去了？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我向你甲班的老任同学打听过去你的去向。一九四六年解放长春，我藉接收“满映”和“大陆科学院”之机，向抗联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长春卫戍司令员周保中访问过你的情况。一九五一年在沈阳，我向以抗联为内容的《星星之火》歌剧寻觅过你的形象。一九七〇年到七五年间，被打到桓仁县蔡我堡，我向抗联老战士老五保默祷过你和抗联烈士们的忠魂；我向抗联根据地之一老秃顶山凭吊过你和抗联烈士们的英灵。

天飞，你往哪里去了？

哈尔滨解放之初，初在敌伪的档案里发现大批抗联的照片，我查到杨靖宇烈士的面型和他的手枪，陈翰章烈士的头影和他的作战的路线图；但我查不到有关你的遗迹。现在，我也不知道哈尔滨烈士馆里有没有你的牌位。你的所在，谁能告诉我呢？难道我只有问天吗？问天

问地，问天问飞。问你自己吗？

天多么高高，空阔，高高，空阔……鹏鸟飞着，鹏鸟飞着……天是飞的，天是飞的……
天飞，天飞，飞吧，飞吧……

忆天飞，念抗联烈士；向哈尔滨烈士纪念馆致敬，向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致敬。

一九八〇、八、二七。北京

一九八〇、十一、二三、重改

追忆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 琳

芜 田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齐齐哈尔，是一个贫穷落后、偏僻的塞北小城。人民被迫害，被蹂躏，在痛苦中呻吟……。

1934年，无产阶级文艺战士金剑啸同志，冒着狂风暴雨，来到了齐齐哈尔。他在《黑龙江民报》扎下了营，主编副刊《芜田》，面对着敌人的刀丛，勇敢地坚强地开始了战斗。

《芜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文艺副刊，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红色副刊。

那时，我还在黑江省女子师范读书。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在图书馆，肩靠着肩抢读着《芜田》，刊头是金剑啸同志刻画的：一块荒芜了的田地，一个青年高举着一把铁镐在耕耘。我们为这《芜田》的诞生高兴、激动，这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的生活中的一块绿洲，是我们像沙漠一样干枯生活中的一座泉水。

从此，我们常常到图书馆去读《芜田》。

在《芜田》中我们可以读到金剑啸同志介绍的进步文学，例如，苏联高尔基的作品。我们也读过金剑啸同志写下的火焰一般的讨篇：《布谷鸟》、《兴安岭的风雪》和话剧《黄昏》等，他那句句发光的诗句，一下子把我们青年一代的心灵照亮，也点燃。

《芜田》也是一块绿色的园地，培养爱好文学的青年写作。各校爱好文学的学生纷纷向《芜田》投稿。我的第一篇用晓希笔名发表的《招魂》，就是金剑啸同志亲手定稿在《芜田》刊出的。除我而外还有一些人，其中有“努力”（白拓方）、“关山”、“兰玲”（朱坤青）等同志都是在金剑啸同志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书籍

金剑啸同志不畏惧日寇的刺刀和铐镣，他到各校校刊编委会去发动青年学生读进步的书。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校，一些进步的学生传阅着从金剑啸同志手中借来的高尔基、鲁迅、屠格涅夫、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

我们女子师范学校是金剑啸同志通过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发动读进步书籍的。他在他的课堂，让学生读自己借来的书。我们从图书馆借来的进步书，课堂里读课外也读。

一直到我从女师毕业，青年们还传递着一些进步的书阅读。青年学生们读进步的书，已经形成了热潮。

后来大逮捕时，黑龙江省男子师范学生大傻（他的真名不清楚，这是他的笔名）被捕时，他的裤袋里还揣一本金剑啸同志借给他的高尔基的《母亲》。

这进步的书，就是火种，是金剑啸同志洒下的火种，在青年们心中燃起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向往自由理想的世界的熊熊的烈火……

“白光剧团”和演出

北风在呼啸，大雪在飘落，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大街小巷奔走，他到一些进步的文学爱好者家去组织“白光剧团”。

那是1935年初冬的一天，飘飘扬扬落着鹅毛大雪，金剑啸同志披了一身雪来到庆来小学校找我。他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大衣，系一条雪白的围巾，披着长发，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样子十分潇洒。他从小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一看上面写着“金剑啸字巴来”，官衔上写着“黑龙江省民报副刊《荒田》主编”。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虽然我的一些幼稚的诗是由他修定发表的，他也曾给我打过电话商量稿子，但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高兴地把她让进会客室（会议室），在一条长桌子旁，我们坐下谈着。他很文雅也很严肃，悄声地和我谈：“我来找你参加我们的白光剧团”。我不太愿意去演戏，但又怎能拒绝我的这位尊敬的文学上的老师？我思考着，斗争着，犹豫不定，他等着我肯定的回答。那时我幼稚，哪里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更哪里知道“白光剧团”是个宣传革命的宣传队，终于我作出了使他失望的回答：“我考虑考虑，和父亲商量商量！”。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不太满意。我把他送出门外，看他的身影在迷漫的雪雾中消失了。

听说金剑啸同志很快地把“白光剧团”组织起来了。团员是一些进步的青年。金剑啸同志又编剧又导演又是舞台设计，他可能也是演员。他们排练了好几个剧目：《钱》、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他自己写的《母与子》、《黄昏》。

一天，金剑啸同志又来到我们庆来小学校，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的“白光剧团”要演出了。他来给我送张票，并再三叮咛我：“你一定去看我们演的剧！”

那天的夜晚，我冒着北风，踏着雪路，去黑龙江民报社（现为嫩江地区招待所），我找到了演出的剧场（民报社的礼堂），走进去，剧场已经坐满了人。那夜观众很多，大部分是些学生和工人，窗台上、过路上都挤满了人。

记得那晚上演出的剧目是《钱》、金剑啸同志写的《母与子》也许是《黄昏》。导演、舞台设计都是金剑啸同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动人的演出，从舞台设计、化妆到人物表演都极逼真生动，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剧的内容是：在一个黄昏，母亲病得垂危，儿子焦急万分，想给母亲抓药治病，但手中没有一文钱，为了把母亲从死亡边上救出来，他决心出去偷。出去一阵的儿子抓回了药，正在熬，一阵叮叮当当的敲门声，接着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把儿子双手戴上了铁铐带走了。母亲疯狂地张着双手，在床上喊叫着儿子，听到一阵犬吠声，接着响起一阵枪声，那是打死儿子的枪声。母亲悲痛地在枪声中死去了。

另一个剧是《钱》，内容是：在一个贫民窟里，挤住了一帮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贫穷得一文钱没有，睡在地下。一个人（记得是修鞋匠）的远方的母亲死了，他借到一笔钱，想给母亲买棺材。可是这笔钱却被人偷去了。一帮睡着的穷伙伴们惊醒起来帮他找钱。谁偷去了这买棺材的钱呢？就是同屋的那个小偷偷去了。（记得大至是这样，也许有出入）

看完了剧，观众都很受感动，一面往出走一面纷纷议论：“甚么世道，富人极富，穷人极穷！北风呼啸着，夜漆黑。我在回家的路上还为剧情所激动，在思索着：

“为什么人这般的穷？为什么？”

金剑啸的画展和他的画

金剑啸不仅得诗，写剧，他还是个画家。他悬梁刺股的画，但他的画有很强的战斗作用。在哈尔滨他在抗敌传单上画了许多打倒日本的画和漫画。他的画幅幅都是摧毁日本帝国主义，摧毁旧世界的重型炮弹。他在齐齐哈尔画了许多反法西斯斗争性很强的画，并进行了两次画展。第一次画展，画了“中国前门自杀一条”，“冰天雪地黑良一室”，“十个前高前前”。第二次画展，画了“我已辞去了床来小学校的职务”，“也像去天德那荒原”，“投稿”，“在家摆弄准备功课考大学”。我不知道他举行画展，但是后来从他给福聚的信件里才知道。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美术展览，已经准备就绪，还有几幅画将寄成，定于一月八日在哈尔滨展出。我也没去看他的画展，但听他对他的朋友说，说“我要画使太阳裂的画”。他猜得出他的画一定像柯勒惠支一样，在他的画展里没有山水，也没有花鸟，而是描绘着无产阶级的痛苦和斗争，一定都是鼓动起来推翻旧世界和旧帝国主义的画。想画？他总画过无产阶级的画。我曾看见他的画，画了“画里画里”，“黄炎培共”，“洛王才胆对”，“一草一木画里画里”，“那是一片波浪汹涌的大海，天空上挂着被乌云遮去半面的苍白无力的太阳。大海上升起一群海燕，那海燕嘴里衔着利剑，在海浪中深啄着，吐出闪电，站在船头，海燕们被狂风吹乱了头发的射手，正拉弓射那乌云遮去半面的太阳。我一下子认出这幅画的主题是：“打倒日本！”

从监狱中带来的消息

1936年春，齐齐哈尔充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恐怖，抓人的电驴子（那时电驴子是日本鬼子抓人的），突然地响着，在大逮捕。齐齐哈尔乌云滚滚，人心惶惶。金剑啸同志离开了齐齐哈尔，又转移到哈尔滨。他在哈尔滨又开始了战斗，由于在《大北新画刊》上登了一条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因此在哈尔滨被逮捕了。1936年6月又押回了齐齐哈尔，关在齐齐哈尔的铁牢里。

齐齐哈尔这年六月仍在大逮捕。我们院的门前停了一辆抓人的电驴子，抓走了我院的黑龙省民报社社长和一位体育教员。

过了些日子，听母亲说被捕的那位体育教员从监狱放出来了。我跑到他家去打听金剑啸同志的消息，他高兴地讲给我：

金剑啸很好，他很乐观，也很坚强。

金剑啸虽然戴着铐镣，戴着敌人鞭打的伤痕，他还在监牢里教难友们唱海燕之歌，教难友们普希金的诗。

我问：“监狱里有普希金的诗集吗？”

他说：“没有，是金剑啸背下来的，他能背不少普希金的诗，他一句一句地背，一句一的地教，他一首一首地背，一首一首地教。”

我问：“你也学了吗？”

他说：“我在隔壁听不清，也背不会，只听到这样的句子：

我们飞去吧，是时候了，

我们原是自由的鸟儿，飞去吧，

飞到那乌云的后面明媚的山峦，

飞到那里，到那兰色的海岛，

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在作伴。

这是普希金的《囚徒》诗。

金剑啸同志不是在教诗，他是在战斗，在监狱中，还在继续战斗，那是宣传鼓动“囚徒”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号角。

金剑啸同志光荣就义

一个不幸的消息：“金剑啸同志光荣地就义了”。在齐齐哈尔传开！

那是1936年8月15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把金剑啸同志从铁牢里提出来，他戴着铐镣被押上囚车，驶向齐齐哈尔北城门外的旷野——刑场。

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金剑啸同志就要和他的祖国，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和他的亲密的战友，永别了。这虽然是件心碎肝裂的悲痛的事，可是金剑啸同志早已立下了大志：

“生命和爱情虽然宝贵，为了祖国、人民的自由，二者皆可抛！”

这天，他丝毫没有畏惧，也没有悲伤，愤怒地蔑视着那些刽子手日本鬼子，昂着首，挺着胸，战斗到最后。在囚车上，一路他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没关系，老爷现在二十六，再过二十年我的孩子长大了，又出来一个金剑啸！”

我听到金剑啸同志就义的消息太迟了。跑到刑场，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听见滚滚的嫩江水在为他控诉！

萧萧的秋风在为他悲泣！

我禁不住的泪水从手缝中滴落！

听说他没有人收尸，也没有坟墓，没有碑文。他的女儿金伦、女婿里栋到齐齐哈尔寻查，知道有人收尸，也有坟墓，在齐齐哈尔南郊。可是现在那墓早已平了，还是没有墓。

今年是金剑啸同志逝世四十三周年，我写这篇文章来悼念他！

金剑啸同志安息吧！你的坟墓是建筑在人民的心中，你的丰碑也刻在人民的心中！

1979年10月26日

